




科恩历史哲学研究

陈伟 著

*On Gerald Allan Cohen's
Philosophy of History*

 复旦大学出版社

科恩历史哲学研究

陈伟 著

*On Gerald Allan Cohen's
Philosophy of History*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恩历史哲学研究/陈伟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309-13316-5

I. 科… II. 陈… III. 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研究 IV. ①B0-0②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2324 号

科恩历史哲学研究
陈伟著
责任编辑/陈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2 字数 153 千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100

ISBN 978-7-309-13316-5/B·645
定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恩历史哲学研究”（批准号：10CZX009）
结项成果（证书号：20161834）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唯一有活力的思想潮流,但是,在我看来,它的确是重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最有前途的一般战略。

——[美]E. O. 赖特

一、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背景下更全面、深入地认识和理解科恩历史哲学

本书的研究主题是科恩历史哲学,但是,必须首先将其置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大背景中,才能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科恩历史哲学。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自 20 世纪 70 年代在英、美等国学术圈兴起以来,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鲜血液和创新成果,以其科学性表现出了丰富的理论价值和坚强的实践生命力。迄今,该研究已经过四十多年的成长,无论是他们的学术团体“九月小组”还是他们的研究主题,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国内学者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跟踪研究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现在也开始逐渐表现出自己的研究特色。具体而言,对国内外研究情况分而述之:其一,国外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以“九月小组”为核心,以其他学者的追随或者批评为外围。自 1979 年 9 月伦敦的周末聚会开始,科恩、埃尔斯特、罗默等人讨论的主题最初集中

在剥削论域,1981年9月起,“九月小组”讨论的主题日益广泛化,但主要分为三类:一是经验理论研究,主题是历史唯物主义、阶级等问题,主要以科恩和赖特为代表;二是规范理论研究,主题是剥削、平等、公正分配等问题,主要以科恩和罗默为代表;三是方法论研究,主题是功能解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博弈理论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理性选择理论等问题,主要以科恩和埃尔斯斯特为代表。当然,这种划分并不否认他们也不断涉猎其他领域。20世纪90年代之后,他们研究的主题基本转向政治哲学领域。进入21世纪之后,“九月小组”成员开始关注恐怖主义、女性政治、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的议题。追本溯源,可以说,他们研究的关键词是马克思基本主题的继续,即批判资本主义、教条主义和“胡说的马克思主义”,构建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寻求资本主义的替代选项。就这一点而言,无论“九月小组”的成员是否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实际上都在继续马克思的研究事业。其二,国内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从最初主要是译介、跟踪性的研究,到现在正逐步转向参与和对话。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就有学者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进行翻译和介绍。虽然那时译介的作品在数量上不算太多,但是引进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新思潮,并对其进行了一定的批判,这些都扩展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野和思路;经过许多学者专家的不断努力和探索,现在,国内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始运用逻辑和语言的分析技术、模型建构和理性选择理论等分析技术研究当下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等领域的一般主题,甚至包括全球性的热点问题,并参与国际学术讨论,与国际同行对话,不断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领域发出中国的学术声音。

前面是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情况的一个概要介绍,后面在第一章中有专门的论述,接下来先谈谈本书的整体构思。本书包含双重结构,一明一暗。“明结构”是本书的章节安排,根据研究对象的排序来布局,这将在接下来的第六部分中详细介绍。“暗结构”指本书的研究目的,它们不完全受章节限制,没有全部以章节标题的形式出现,但是它们

或者说对它们的思考内在地贯穿于本书的整个论说过程之中。

本书的“暗结构”是：一个中心，六个问题。“一个中心”指以科恩历史哲学的经典文本《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为中心，通过对该经典文本进行宏观和微观的双纬解读，展开科恩历史哲学的真意和价值。“六个问题”指围绕科恩历史哲学而展开的六个基本问题，即（1）源起——主要阐述科恩的学术选择与其生活经历之间的关系，科恩历史哲学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科恩历史哲学与马克思历史哲学之间的关系；（2）内容——科恩历史哲学的基本内容；（3）方法——科恩历史哲学所运用的主要方法论；（4）局限——科恩历史哲学中的不足和局限；（5）坐标——科恩历史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价值；（6）批判——从对科恩历史哲学的研究出发，探讨马克思历史哲学研究的创新之路。围绕这“一个中心，六个问题”，本书关注的重点是：科恩是如何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并构建其历史哲学的？科恩历史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有什么重要意义？这两个问题需要细致的阐述和论证，它们是本书致力于回答的重点。

本书的目标是论述科恩历史哲学，并在对其批判的基础上显示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新路径。全书紧紧围绕科恩历史哲学的主题词：“主流方法论”“发展命题”“首要性命题”“合法性问题”和功能解释等。“虽然这里探讨的领域并不宽广，但是，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重建而言，它是决定性的基础。”^①

二、运用“主流方法论”分析科恩历史哲学

本书是对科恩历史哲学的系统论述，主要采用和科恩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相同的方法论，即主要运用“主流方法论”尤其是分析哲学的方法论，对科恩历史哲学本身进行分析。这里的“主流方法论”是指现代西方

^① William H. Shaw,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4.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通常运用的方法论,主要包括逻辑的与语言的分析技术、经济分析技术和理性选择理论等。但是,在对科恩历史哲学进行批判的时候,我们会运用到整体论和历史主义等方法论。

由于“主流方法论”具有鲜明的科学特征,从而使包括科恩历史哲学文本在内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作品表现出如下风格:特别注重界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厘清概念之间的结构关系,从而使表达更精确;强调命题成立的逻辑根据,明晰命题的真假界限,从而使命题更严谨;关心论证的前提真实性和逻辑有效性,从而使论证更相关、更充足和更有说服力;同时,以博弈理论、数理模型和调查分析等方法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建立微观基础。这样做的结果有其双面性,“优点”是这样的作品更为清晰、准确和严谨,符合逻辑论证的规范;“缺点”是这样的作品容易显得机械化、呆板化,“因此,它更易于被批评,但是我并不对此感到遗憾”^①,因为这至少比模糊含混、模棱两可地论述而很难被批评要好得多。因为独特的方法论风格,使得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国外马克思主义诸多流派中脱颖而出,正如赖特评述的那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唯一有活力的思想潮流,但是,在我看来,它的确是为重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最有前途的一般战略”^②,这或许可以成为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和借鉴科恩历史哲学的重要理由。

此外,在借鉴先进的学术资源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为我们做出表率。无论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还是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无论是英国的政治经济学还是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无论是先进的社会科学还是先进的自然科学,只要是先进的思想资源,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进行批判的借鉴和吸收,从而为自己的理论创新服务。在这一点上,相对而言,作为整体论、实践论和历史主义较为流行的国家,我国

^① G.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ix.

^② E. O. Wright, *Interrogating Inequality: Essays on Class Analysis, Socialism and Marxism*, Verso, 1994, p. 179.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承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传统。我们不能简单地拒绝现代西方主流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要适当地批判地学习和借鉴,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创新服务。

也许有人坚持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赞同;但是,需要补充的是,这丝毫不否定逻辑具有检验真理的功能,甚至是检验真理的一种重要方法。因为任何真正的理论除了靠实践检验之外,理论的分析 and 证明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一种实践在思想上不符合逻辑,那么它就无法被真正理解和完全认同。对于理论研究而言,坚持逻辑分析的技术有助于避免实践上的周折和不必要的代价。并且,坚持逻辑分析的理念和方法,有助于不被主观主义缠绕,不被教条主义束缚,有助于更好地检验真理,从而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因此,在坚持科学分析的规范标准这一点上,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不会反对。况且,马克思本人曾经在批评盲目的追随者时明确地表示“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①,这正说明马克思本人反对那种对待其理论的教条主义或主观主义的态度。因此,从坚持科学分析这一角度而言,科恩是正确的。

三、分析方法的清晰性和严格性要求、相关文献资料的占有情况和我们的思辨特征对本书的阐述和批判的规制

关于分析方法的清晰性和严格性要求,这不仅取决于我们对科恩历史哲学的忠实理解,更先在地取决于我们的相关分析技术能力。科恩曾明确指出,“因为看到一种理性方法在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中的效用并发现了它的吸引力,所以就能轻易地接受和运用这一方法,这是极端困难的。我所描述的方法的实践要求一个训练过程,一个学徒期”^②。在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9页。

② G.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p. xx.

一方面,我们已经初步具备理解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训练过程”和“学徒期”。作者在硕士阶段攻读的是逻辑学专业,博士阶段攻读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1999年开始从事现代逻辑、逻辑哲学、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然后在2004年转向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迄今已经十多年。即便如此,作者深知,分析功夫的深浅仍然会成为行文水平的一个必要参数。

在对文献资料的占有方面,无论从权利层面还是从权力层面,本书都比较全面地占有科恩历史哲学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最重要的文献资料^①,以及国内外学者对科恩历史哲学进行论述和批判的第二手甚至第三手资料。关于科恩历史哲学的作品,国外文献资料应当从1970年科恩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批判》^②算起,国内第一本系统地介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则是1993年余文烈先生的作品《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③。科恩的历史哲学作品是运用分析技术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命题进行分析和论证;关于科恩历史哲学的第二手作品(和第三手作品)则主要是对科恩历史哲学进行阐述和评判。我们已有的中文资料虽然绝大部分还限于译介工作,但不夸张地说,他们已经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传播和批判做出了先驱者意义上的重要贡献;当然,由于大量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科恩历史哲学的一些重要文献至今还没有被翻译成中文,所以,我国学者对科恩历史哲学的研究仍有待深入。

在文本的依据方面,我们坚持以科恩历史哲学的原著为根本依据。即使我国已有一些译本,比如,我国已经有G. A.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威廉姆·肖(William Shaw)《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① 感谢G. A. Cohen在参考资料方面的帮助,当年(2005年)他既惠赠了我难以搜集到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资料,又从我列出的文献目录中推荐了他认为的重要作品。

② G. A. Cohen, "On Some Criticism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 Vol. (1970), pp. 121 - 141.

③ 余文烈:《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重庆出版社,1993年。

等相关文献的中文译本,但是,我们在引用他们的观点和论证时,仍然坚持以原著为依据;除非没有找到相关的原著作品,或者为了斟酌对原文理解上的准确性,以便确切地把握作者的真实意思。

在参考国内外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一个是知识性的误差,主要表现为理论和观点译介不够准确。有的学者在翻译中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而把原作者的重要观点翻译得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使原作者的观点出现了逻辑矛盾,另有学者甚至在原作者所属大学这样的基本资料上出错。尽管这些不是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但会使读者对其他方面包括学术观点阐述的准确性产生合理的怀疑^①。另一个是解读性的误差,主要表现为:(1)“忽略语境”,没有根据科恩有关作品的上下文来进行解读,而是随意阐论,尽管初读起来似乎头头是道,但那些不是科恩的观点表达,而是解读者的意见发挥;(2)“轻率概括”,有的文献资料既缺乏认真的考证,也没有根据逻辑的严格性进行证明,而是以点为线,以线为面,以偏概全,轻率地做出了自己需要的或者社会需要的非逻辑的结论。这些问题给我们以提醒,也许一般而言,在译述、评论过程中不能完全避免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同时,我们也不能说我们自己已经完全避免了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注意到了这样的情况,并且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这里想表达的是,本书一方面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阐论科恩历史哲学,以保持其表达的清晰性和论证的严谨性;另一方面我们努力坚持以清晰性和严谨性作为论证我们自己观点的学术标准。

至于本书的思辨特征,主要是指作者的思维方法、分析技术和论证方式所展示出来的思辨情况,这是每一个生活在一定现实世界中的个体

^① 在这里,我们不提及具体的作者作品,因为文本出现的问题也许是因为某些特殊的技术原因。如果读者要核实我们这个命题的真实性,只要把相关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引文进行中英对照和文本研究,就可以很容易地证明该命题的真实性。

都必须面对并且无法超越的。如果简单地来说,本书的思辨特征可以概括为:分析为主,综合为辅。作者已经接受现代逻辑和分析哲学的长期熏陶,处理哲学问题时自然倾向于坚持“主流方法论”尤其是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技术路线;但是,“反者,道之动”,因为受到国内生存论路向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以及国外分析哲学中思辨的形而上学的不可思议的增长和繁荣^①,所以在反思和批判科恩历史哲学时,我们可能会不自觉地表现出对“感性活动”的某种偏好、对方法论整体主义的运用和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探究等“综合性”倾向,这些和“分析性”共同构成一种客观的前提性规定。

四、走出“剧场假相”^②,坚持一种“信仰而不奉承”^③的理性立场

如果说科恩对马克思主义持一种“信仰而不奉承”的态度,那么他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类同于一种宗教,而是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类同于科学。在这里,“信仰”是一种价值选择,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政治承诺;“不奉承”是一种方法选择,是认为只有不敬畏、不奉承的批判性探究才能实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④,才能真正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对于科恩历史哲学,国外学术界大体上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持赞成或友好的态度,如安德鲁·莱文、理查德·诺曼等人。他们认为科恩的研究“坚实了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基础”,其工作是“令人尊敬和钦佩的”“具有开创性的”,“科恩历史哲学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另一种是持批判

① 参见[英]T. 威廉姆森:《近40年来分析哲学的转变》,徐召清译,《世界哲学》2015年第4期,第5—24页。

② 参见培根的“四假相”说: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和剧场假相。Francis Bacon, *The New Organ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0, pp. 40-42.

③ G.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ical: A Defence*, p. xvii.

④ 习近平:《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页。

甚至排斥的态度,持这种态度的学者并不少,如埃尔斯特(Jon Elster)、塞耶斯(Sean Sayers)、曼德尔(Ernest Mandel)等人。埃尔斯特怀疑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功能解释是否“合法”,他更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基础,更愿意从微观上寻找一种马克思历史哲学的解释学;塞耶斯等人则认为科恩历史哲学是“一种学院式的语言批判”或者“是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肆意扩展”,其工作本身恰恰是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对于上述各种批判,科恩做了比较详细的回应。国内对科恩历史哲学的研究起于20世纪80年代,迄今为止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重点是对科恩历史哲学进行翻译、介绍以及简单的述评,以余文烈、段忠桥等为代表;第二阶段是21世纪初的10年,重点是对科恩历史哲学进行分解式研究,以段忠桥、俞吾金、魏小萍、陈伟等为代表。现在正进入第三阶段,已到了对科恩历史哲学进行系统研究的时间。通过系统地清理科恩的历史哲学,借鉴其有益的思想和方法,批判其不足和局限,为下一步深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奠定基础、扫清障碍。

作为一个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衰落时期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科恩将左派献身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现代西方主流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结合起来,对马克思经典理论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它的形态和结构必然会全部地依赖于他的学术和时代遭遇,这是他的历史命运,无法超越,因此科恩历史哲学自然有其不可超越的局限性。在本书中,我们对其持一种严谨的批判态度。所谓严谨,指的是一种逻辑风格的思维方式,不追求简单的辩证思辨,既不盲目吹捧,也不随意批评,而是追求在客观陈述的基础上“有理、有节”地评判,努力做到言之有据,表达清晰,论证有力。如果说我们反对以意识形态的态度对“资产阶级”的理论进行绝对地批判,因为那样违背了科学的标准要求和理性精神,那么我们同样反对因为自由主义的浸染而认为西方的都是正确的,因为缺乏批判的吸收更是另外一种教条主义的表现,是一种披着自由主义外衣的新教条主义。因此,对科恩历史哲学我们坚持批判的态度。例如,在为生产

力的首要性地位进行论证时,就不能忘记“感性活动”的能动作用。“感性活动”使历史成为现实的人的历史,而不是抽象的“技术决定论”或者“经济决定论”的历史,因为那些观点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源出同根,都是知性的形而上学范式;而同源于主观意识的“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批判主义”也都是对“感性活动”的蔽而不见,他们没有认识到,正是“感性活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新视域,正是在“感性活动”中达到了对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两分思维”模式的超越。至于“感性活动”如何展开,正如吴晓明教授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的“感性活动”之展开有两个基本的前提规定,一是:“它必然地处在现代世界的格局中,而这一格局意味着现代性的主导原则(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之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普遍展开”;二是:中国“非常独特的文化传统”^①。在这两个基本的前提规定和社会现实中,如何深入而切实地综合这两者成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课题与历史使命。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认为,无论是逻辑的分析路向,还是实践的生存论路向,都是对现实问题的一种学术回应。在理论和科技“指数级”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博采众长,才不失为一种客观公允的态度。因此,我们对科恩历史哲学持一种“同情式理解,批判性建构”的立场。我们希望通过与科恩历史哲学、马克思经典文本和现实生活实践等多纬度的对话,显现出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发展的新的可能性。

五、在批判的同时,强调分析方法的无可替代性,阐发科恩历史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在批判科恩历史哲学的同时,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存论路向。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

^① 吴晓明:《哲学的时代课题与使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4页。

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①正是这样一种生存论的路向显示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另一种可能性。但是,如果在坚持生存论路向时无视或者不够重视分析方法的重要性,那么就如坚持纯粹的分析而忘记生存本体一样,都是未能反思并走出“剧场假相”,未能批判地认识“对象化世界”。

如果问研究科恩的历史哲学有什么意义,那么从它们的经典作品一问世就能够引起国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和热情这一现象就能看出:它本身的存在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具体而言,研究科恩的历史哲学的实践意义至少有三:其一,它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指导思想,研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有助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多一个研究的思维视角,更清楚地从认识上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意义的理解。其二,它有助于我们在实践中依据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在建设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正日益走向“深水区”,这就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研究马克思主义,借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成果,如科恩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功能解释,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就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并对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有重要影响。其三,它有助于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普遍化。科恩历史哲学有强调细节、注重概念明晰和论证严谨性的优点,是“科学的”马克思历史哲学。在科学大行其道的今天,借鉴当代西方“主流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批判地吸收当代西方主流的哲学社会科学分析技术,形成中国式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风格,必将有助于我国马克思哲学学术作品的国际化认同,有助于推进我国马克思哲学学术研究的普遍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97—798页。

同时,研究科恩的历史哲学的理论意义也至少有三:其一,它有助于我们借鉴吸收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合理成分,推进科学解读马克思经典文本。科恩十分明确地反对僵化的教条主义和“胡说的”主观主义,拒绝纯粹意义阐发式的理论说教或者价值呼喊,而是坚持科学分析的务实态度,以科学的方法论深入地做好证明的“无用功”,为观点提供坚实可靠的逻辑性证明。这种态度以及有关的分析方法,正是我们急需借鉴和学习的重要方面。其二,有助于打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之门。科恩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重要代表,而科恩历史哲学又是其整个学术思想的发源地和根基。可以说,研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不先研究科恩;而研究科恩,就不能不先研究科恩的历史哲学。其三,它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研究。马克思本人就主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创新原有的理论。科恩的历史哲学正是这样的资源,加强对其研究,有助于启发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创新。

六、主要内容

科恩历史哲学以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为主线,提出了许多新的东西,例如“发展命题”“首要性命题”“合法性问题”和功能解释等,这些都极大地动摇和改变了人们对唯物史观的传统观念,开拓了一条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非常有影响的新路径。科恩历史哲学在国外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掀起了研究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一轮热潮,即使到政治哲学研究大张旗鼓的今天,这个研究热潮仍未过去。

科恩历史哲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说其坚持科学性,在于其以现代哲学和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重新诠释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以科学标准自我严格要求的一种尝试;说其坚持革命性,在于其鲜明的态度,反对“胡说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的马克思

主义,坚持真正承继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以活生生的现实实践为理论的生长点。同时,科恩的历史哲学实质上又是科学理性和价值辩护的结合,其前期工作基本上是清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夯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基,而这个工作是以科学理性为标准和方法论的;做好这个根基性工作或者说这个根基性工作基本完成之后,科恩就开始面对更为直接和更为紧迫的现实问题,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规范命题进行阐述,为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价值进行辩护,构建当代的社会主义理论。

本书以科恩历史哲学为主题,阐述科恩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科恩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以及功能解释等有关问题,并在阐述的过程中对科恩历史哲学进行适度批判,尝试提出我们的观点:只有掌握科恩历史哲学的新方法、新成果,才能坚实历史唯物主义的根基;只有将分析和综合结合起来,才能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只有揭示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存论意义,才能洞穿近代形而上学思维制式的幻相。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书的思考和撰写过程中,“暗结构”是前面第一部分中所说的“一个中心、六个基本问题”,更深层的关怀其实是三个问题,即科学与人性(关于确定性的追求)、经济与历史(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自由与平等(关于社会发展的目标)的均衡问题,所有的阐述都是对这三个问题的思考和探究。

本书的主体内容包括六章,前两章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大背景中论述科恩的学术渊源和方法论,后四章详细讨论科恩历史哲学的主要内容。第一章写科恩历史哲学的学术背景,主要阐述科恩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九月小组”之间的内在关联。以科恩为旗手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批具备“主流方法论”分析技术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承诺”双重特征的学者,在科恩等人的召集下有了“九月小组”,他们的研究是对马克思理论模糊问题和时代危机问题的一种积极回应,至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标签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名称。第二章论述分析的方法论及其主要特征。在“主流方法论”中尤其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分析哲学的分析技术(逻辑分析与语言分析的方法)的四种具体类型;